

THE INCIDENCE OF CHINA'S LEADERS THINK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一个美国人眼中改革开放的真实故事

中国30年

人类社会的一次
伟大变迁

[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著

吕 鹏 李荣山 等译 李 康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30年

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著

吕 鹏 李荣山 徐 辰 吕佳龄 译

李 康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 (美) 库恩
(Kuhn, R.L.) 著；吕鹏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书名原文：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30-Year
Reform: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SBN 978-7-208-08355-4

I. 中… II. ①库…②吕… III. 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000 号



世纪文景

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著

吕鹏 李荣山 徐辰 吕佳龄 译 李康 校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80×980 毫米 1/16

印张 31

插页 30

字数 491,000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55-4/C·325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序言 1

| 第一编 改革的指导原则 |

第1章 自尊 17

第2章 稳定 30

第3章 责任 37

第4章 远见 44

| 第二编 改革的历史脉络 |

第5章 艰难的探索与“文革” 53

第6章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65

第7章 改革生根发芽 76

第8章 经济特区 83

第9章 改革闯关 95

第10章 “天安门事件” 99

第11章 邓小平的南方之旅 105

第12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17

第13章 所有制问题 128

第14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35

第15章 科学发展观 141

| 第三编 改革的运作机制 |

第16章 经济改革 153

第17章 地方改革 162

第18章 区域改革——浦东和滨海 181

第19章 国有企业改革 189

第20章 企业破产 201

第21章 民营经济 206

第22章 新社会契约 214

第23章 社会改革 223

第24章 保持社会平衡 233

第25章 农村改革 245

第26章 惩治腐败 258

第27章 个人思维的变化 263

| 第四编 各部门的改革 |

第28章 银行改革 273

第29章 科技改革 288

第30章 教育改革 303

第31章 医疗卫生改革 311

第32章 文化改革 320

第33章 媒体改革 330

第34章 出版改革 344

第35章 电影改革 357

第36章 互联网的发展 368

第37章 军事改革 379

第 38 章 宗教问题	386
第 39 章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399

| 第五编 改革的未来前景 |

第 40 章 中国的经济前景	415
第 41 章 中国的政治未来	426
第 42 章 “中国威胁”抑或“中国机遇”?	441
第 43 章 回顾与展望	454

注释 467

致谢 478

作者简介 484

译者附记 486

序 言

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孤立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境况，变为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充满干劲、经济突飞猛进、广泛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完全可以认为，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转型。

有两个统计数据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分别是手机用户和网民数。1980年时，改革刚刚开始不久，全国仅有200万部电话，当然，全都是固定电话。然而，时间过去还不到30年，中国的固定电话数每年新增3500万部，而手机用户则突破了6亿，是世界之最，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数量也已突破了2.5亿，超过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市场。

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改革30年的故事。这30年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期，人们在形式上，将这个时间段的起点定在了1978年12月18日，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在此前举行的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成了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纯洁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政治务实和经济增长。

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并且也理应如此。全国各地将举办众多庆典，有些还相当隆重。今天的中国，几乎

任何一件影响日常生活的事物，都是由改革缔造、引致的，或深受改革的影响。有人认为，此番 30 周年纪念意义重大，将会成为 2008 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里，30 岁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在《论语》中，孔子云：“三十而立。”30 岁意味着成熟或者自立，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

改革取得的进展令人惊异，连续 30 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近 10%。这自然也就有了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以及矛盾。因此，今天的中国，伴随着举世瞩目的发展，也积聚了大量未曾遇到的难题，并且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十分棘手。这些问题在国家积贫之时，都是不可思议的，诸如收入不均、腐败，以及相当普遍的工业污染。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新的改革战略——科学发展观，这是一种面向现代、综合全面而深思熟虑的指导思想，它在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充分考虑了社会、环境以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来说说我自己吧。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上的。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从事的就是脑研究，我自己制作并主持了一档关于科学新知的公共电视系列节目，叫做《走近真实》。许多国际顶尖专家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讨论前沿科学，并且努力去理解新知识的意蕴，尤其是有关宇宙、意识，还有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知识。¹我讨论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何以对全球社会产生影响，并且能融合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事关族群、宗教还是政治。²我论述了科学如何独自或与哲学（和宗教）一道，帮助我们探索自身的起源与终结，以及任何现存的可能意义与目的。³

科学提高了我们的辨别能力；科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得以判定事实是否与理论相吻合，或者，在政治领域，实际情势是否支持所建议的立场。科学的精神是各民族共享的，它穿越不同的文化，联结起纷繁的社会元素，传递对于美的欣赏，帮助领会新发现的价值，把握浩瀚宇宙惊人的复杂性。认真说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教育与研究，是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最有效形式。通过提升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精神，我们可

以催生一种趋同的思维方式。

正是我自己始终坚持科学视角，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的经历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他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科院校清华大学接受科学与工程方面的训练，也是在那里最初塑造了他“科学发展观”的视野。我首先学习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并见识了它在实际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不同的省份，面临不同的挑战），然后开始用它来衡量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用科学发展观，来向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媒体介绍关于当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这里既有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也有不容回避的现实挑战。⁴

2005年，我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撰写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中国出版，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自那时起，我就常常被问到：作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又是职业的投资银行家，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一本书？与此类似，当我对有关胡锦涛总书记的观念和政策所作的访谈以及写就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和各类国际媒体上，并且其观点常常与欧美的中国问题专家相反时，也经常有人问我：作为脑科学研究的博士，又是公司并购方面的专家，为什么会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向外国读者阐述一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视野？

这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答案：我之所以要为江泽民作传，之所以要讲述胡锦涛总书记的政策，就是因为我感到，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读者而言，了解有关中国的真实故事极其重要。我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是这样，它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我的这种愿望适用于自己的三个基本兴趣点：前沿科学、投资银行，还有中国。

我为江泽民写的传记为读者呈现出的是近80年的时间跨度，是一部动荡的中国现当代史。从日本人对中国恐怖而野蛮的侵略与占领，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群众政治运动（例如“反右派”运动，“大跃进”），“文革”浩劫，邓小平领导实施的改革，以及紧随其后的20年经济空前发展期，当然改革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挑战。而我对胡锦涛的观念与政策的解读，则会帮助外国读者理解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的各

种挑战，以及他们必须从多重目标中作出的选择，这些目标常常潜藏在种种矛盾之中，必须同时解决。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哲学，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写这本书花了四年时间，当然，如果把所有我在中国度过并且作出思考的时间也包括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时间就要长得多，几乎长达 20 年。2005 年以来，我有幸走访了中国 20 多个省份的 40 多个城市，会晤地方官员（包括党、政、商、学各方面），接触普通百姓（有学生、工人、农民、警察、解放军战士、下岗工人、退休人员、记者等）。这一路走下来，我常常驱车五六个小时，辗转于两个城市之间，因此对于实际发生的变化，还有包括领导人和普通百姓在内的人民真正的所想所言，我都积累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我的兴趣点主要在于，不同的地区是如何产生不同的问题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各地区之间如何迥异，这种复杂性通常说来并没有引起外国媒体的真正重视，但正是这些差异，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质疑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所持的那种普遍简单化的观点。

相熟的好友建议我进行这次中国国情调研，他们说尽管我对中国十分了解，但是我过于专注北京（以及上海），将会自囿视野。特别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冷溶（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建议我依据实际情况制订调研计划，考察中国各主要区域——东北、华中、东南、西部、边疆——的特殊情况。他首先帮助我深入探究了中国的政治学说。冷溶强调指出，如果看不到中国整体所具有的多样性和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不可能意识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此外，他也提醒我注意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浙江模式”，因为他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现任国家副主席）以及他的工作团队正在合作，准备写一套书来分析浙江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与多年好友兼搭档朱亚当一起踏上旅途，揭示着中国各地的和谐共性与不谐杂音，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经过这些深入的国情调研，鉴于我个人的科学视角，我越来越赞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强烈的兴趣，原因之一是我亲眼见到，中国要多方应对各种严峻的系统性问题，比如收入不均、失业、农民工问题、腐败、犯罪、金融系统脆弱、能源限制、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污染、道德观与家庭观念变革等等，而且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表现各异。有的问题是由于经济急剧发展导致的；有的源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还有的是为了适应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的需要。

2006年3月，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了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尽管那次我们是不期而至，但他仍然从自己繁忙的日程里挤出时间和我们见面。他很有风度地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我们对于你对中国所倾注的热情和进行的研究表示敬佩”。

在我们谈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时，习近平也给出了他的建议。他说，尽管对很多外国人来讲，会很自然地试图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或者是用单一的方法对中国一概而论，但中国太过复杂，无法如此描述或概括。习近平借用中国古代寓言“盲人摸象”来说明这个问题。不同的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不同部位，他把中国富裕的东部沿海比作大象那条腿，而将中国广袤的西部比作大象宽阔的后背。“就像我们古代寓言所说到的，要避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他说，“一头大象，有的人摸到一条腿，有的人摸到它的背，得出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象就是象，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必须全面地了解。”

“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有东、中、西这几个不同的区域。”习近平继续说道，“中国有城市，有农村，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看到了东部的外国人，可能会如同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会说‘这是一根柱子’。看到了西部的外国人，可能就是摸到了大象的背，认为这是‘一堵墙’。但是应该把东、中、西连接起来，把56个民族综合起来，然后把不同的区域文化背景归纳起来，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中国的印象。”

习近平说，看中国，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横向”来看，也可以追随它悠久的历史“纵向”来看，他建议我研究中国就要既看横向，也看纵向。横向的思路他刚刚已经描述过了：对于不同地区、省份、经济体、民族等等，观察它们之间的多样性。而纵向的思路，他解释说，

就是要研究中国发展的历史。在当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这本书或许就可以成为一种“纵向思路”的表达，但同时隐藏在其中的，又是一种“横向思路”。（也可以在这两种方法上继续扩展，考虑在纵向思路的不同时间点上考察横向思路；换言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考察不同地域的多样性。）

习近平的建议打动了我。它们成为我工作的一个灵感来源，促使我更加努力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大多数外国媒体不愿讲述。它的叙事方法或许有悖某些人所愿，它的诞生或许带有我个人的色彩，但是它却是我深有所感、不吐不快的故事。

《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并不是对中国作全景式的描述，也不是对其令人瞩目的改革的历史作完整的记录，而是主要根据这 30 年里不为人知的内情，探索现状，并展望未来。正如本序言所要表明的，中国的领导人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所在，不仅要考察他们的所言、所为，还要考察他们的思维方式。

外国人通常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集中在经济领域，其实大谬不然。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变，无疑令人吃惊，但是，它还算不上中国最根本的变迁，而只能位列其次。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知道，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最重大变化，是中国人的精神的转型，还有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个人自由。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话可能被认为值得商榷，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以及中国人思维方式发生的变化，这才是这个史诗般宏伟的故事里最重大、最精彩的部分。有鉴于此，我要来探索改革对于社会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文化、传媒、电影、出版、互联网、医疗、宗教，以及国有企业、金融、民营经济等。

我们也会关注长期以来频频出现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种种误解。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99 年，北约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攻势，但是北约的 B-2 隐形轰炸机炸毁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

使馆。事件发生后，北京的大学生群情激愤，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这一暴行。在此情况下，政府用公交车把大学生从各校校园送到美国大使馆前表示抗议。学生们不仅举起标语，还向大使馆投掷石块。面对这种情形，美国的媒体猜测，这是中国领导人精心策划的示威游行，目的就在于煽动起国民的民族主义热情，以此将大家的注意力从内政问题上转移开来。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领导人确信学生将会对美国表示抗议，并且无法阻拦，他们深感忧虑，如果听任这些十分激动的学生穿城游行，那么，工人和市民就会大量加入他们的队伍，引发更大规模、处理起来也更加棘手的问题。所以，用公交车运送学生，是在控制一触即发的事态，而不是火上浇油。美国人只看到了表面情况，即中国政府为学生的抗议提供了便利，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轰炸也暴露出另一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超过90%的中国人，包括那些经常对本国政府提出批评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都认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有意为之，是公然挑衅。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却相信美国政府官员所坚持的说法，这是一起由于使用了“旧地图”而导致的意外事故。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中国人对美国人有一种理想化的想像，认为他们在技术上非常发达，似乎不可能犯这种很愚蠢的错误。而美国人却对他们的政府制造愚蠢的错误习以为常了。

要避免误解，就需要坦诚相待。首先就是坦率地描述彼此的看法。先让我直言几句吧。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政府致力于“遏制中国”，并阻挠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很多中国人说，这就是美国政府要支持台湾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美国将台湾视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凭此，美国就可以确保其对于中国的优势，使中国人的祖国处于分裂的状态。美国还输出西方文化来挤压中国文化，一步步侵蚀着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则认为，中国不仅是贪婪的经济竞争者，而且还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潜在挑战者，一个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其意图晦暗不明，但却日渐形成威胁。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以其自身的利益作为行动

准则，但是在美国的观念里，中国在行事时只顾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国际秩序。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商业掠夺者，通过人为压低币值来刺激出口，还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中国也是一个压制社会，为了维持共产党的控制而不惜践踏人权；中国还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军事武力威胁，怀有扩张主义的野心。

中国政府并不讳言，其政策都是为自己的人民谋利益的。他们说，任何合法政府都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也明确指出，在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中，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警告世人，如果破坏了前者，也就扰乱了后者。鉴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前者，也就是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只有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才能维持。

西方媒体通常所刻画的中国领导人形象，以及许多西方人的一般印象，就是一些威权主义者。他们的主要——若非唯一——的兴趣，则是维护手中的权力。

但是，我个人认识其中一些领导人，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威权主义者。西方媒体的描述并不真实，人们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指控中国领导人是威权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不仅不符合实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对现实的拙劣捏造。本书希望能让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更加透明，使他们的观念和态度更容易为外国人所理解。

总体来说，我并不认为西方的媒体就是恶意的，出于自己的某些险恶用心而故意歪曲真相（就像一些中国人可能会以为的那样）。西方世界通常假定，除非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自由选举、合法竞争的多党制，是普选民主政体，并且媒体具有言论自由，否则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而且，如果我们给这个假设加上貌似真实（但其实并不真实）的证据，那么，改革开始之前，那个时候的中国曾经一度是专断、缺乏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其后果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这种认为中国仍在延续专断的错误观念，不论它是多么地缺乏依据、天真幼稚，对于中国的持续发展来说，都会产生不利的影 响，而且这也不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因为它使人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动机令

人恐惧，再加上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容易导致所谓“中国威胁”的一系列错误印象。

一些分析家以己度人，将这种进攻性意图强加给中国，从而鼓吹美国继续大规模扩军，以抗衡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比如一位评论家说，美国需要40艘航空母舰，外加至少1000架新一代隐形轰炸机。

误会的产生十分简单。即便是同样的词语，也有不同的意义或内涵。在中国，“左”与“右”的政治标签的意义，与美国的有关“保守”与“自由”所表示的意义，恰好相反。在中国，“左派”就是“保守派”，这些人的政见以及所偏好的政策，都更偏向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政治控制加以维持。另一方面，“右派”就是“自由派”，他们更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以及西方开放、民主的政府。（邓小平在其政治生涯的晚期，一直都在同时和“左”和右的倾向作斗争。）而在西方国家，左派是自由派，右派是保守派。如果一个人没有语言学的这个背景，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浑然不知。

扭曲既可呈现为宏大局面，也可体现于细微之处。有人煞费苦心地在“维基百科全书”中有关我的条目上加上了一个词——“共产主义的”，以此来“界定”我作为投资银行家为中国企业做顾问的本职工作。那位不知名的编辑，可能是因为不满于我向全世界讲述了真实的中国，觉得必须强调我代表的是“共产主义中国企业”。尽管我很想删掉这个形容词，但出于尊重维基百科的精神，我还是忍住了，随它去吧。

对各国读者来说，避免误会、减少曲解的途径之一，就是领会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在报纸或是网络上看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则需要我们对他的政治思想体系作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要结合中国的现当代史，以及中国前辈领导人政治思想体系的不断演进的背景。

本书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有构筑中国今天的思想基础的官员与学者。我相信，多听他们的谈话比我自己作出评价更有教益。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精确地捕捉他们的人格，不仅描述他们外在的业绩、活动和经历，而且揭示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感。因此，对于我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我并不总是一驳了之。

本书并不是要去探讨在中国每一个人都在想什么，也不试图涵盖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很多书都在努力完成这样的描画，但本书并非如此。我甚至不能较为谦逊地说，本书就是在向读者展示对于当代中国的一种持中之见。我相信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读者也会得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本书的主旨就在于，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给出证据，并且作出理解。我个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所思考的问题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而在改革之前的中国则不是这样。无论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对中国高层领导都应该有比现在更好的了解。我的目标就是更加清楚地阐述并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30年改革开放这一背景之下更是如此。

我曾经访问过《炎黄春秋》杂志的创办人、前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已85岁高龄的杜导正老先生。当时他对我提了一个建议。杜老说：“我是共产党里的一个过来人，我过去很‘左’，我过去整人整得很厉害。整人，被整；整人，被整……慢慢慢慢有点觉悟了，独立思考多一点了，稍微客观一点了。所以以后你们采访的时候，各方面的人都要采访，都要听。他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听，然后自己判断。我们这30年啊，很丰富，故事多极了。”

对于外国人来讲，很容易就会对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形成误解。这包括曲解中国人的自尊感与爱国心的含义，忧惧这个国家愈益壮大。这种误解也延伸到胡锦涛总书记个人，一些人认定他是个专制者，控制着这个你争我斗的国家。这对他来讲会有一种挫折感，因为他肯定不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事实上，在中国，胡锦涛被看做一位明智、正派、诚实、正直的人，他从骨子里立志维持稳定、持续改革、建设中华。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爱戴。

很多中国人有理由抱怨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但是很多中国人也疏于真正了解自己的领导人。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越来越富足，但是没有经历过“文革”，就更不要说“大跃进”、“反右派”运动、解放战争，以及抗日战争了，所以他们体会不到中国

的巨变。中国这些年轻人，可以如其所愿地生活、工作、打扮，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纵然如此，体会自己的父辈、祖父辈如何为改革而进行斗争，以及这 30 年的时间如何改变了中国，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这本书也反映了我自己和中国的情谊。1989 年初，在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博士的邀请下，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研究机构在科技领域改革的早期努力出谋划策，特别是如何适应正处于初始阶段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促成了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之间的一次关于“科学家的社会伦理责任”的研讨会。作为一个接受过科学家而不是律师训练的投资银行家，我曾开玩笑说，或许是我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威胁吧。

之后，我对有关金融政策的问题给出了建议，特别是我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运用并购手段。此后数年，我在经济、金融、媒体、文化、国际交流、中美关系以及宗教等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为国家经贸委开讲座，介绍公司并购，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述政治哲学与美国经验，也在国家宗教事务局介绍西方的宗教。此外，我还曾在“国际道德论坛”上发言，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我和中央电视台有过几次合作，并在中国出版了五本书，出版于 1996 年的《投资银行学》据说是该类图书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出版。

《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讲述了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恢宏篇章，它囊括了那些曾经推行改革以及正在推行改革的领导人的观点，也借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目光，展望了未来。这部书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编：改革的指导原则。该编提出了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思考问题的四种核心方式，这些基本观念构筑了决策，绝大部分政策皆源于此，它们是：自尊、稳定、责任以及远见。

第二编：改革的历史脉络。该编描述了中国 30 年改革过程中，那些引人入胜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里的独特方面与精彩片段。比起面面俱